

赵孟頫《玄元十子图》及其他

卢 仁 龙

赵孟頫（1254—1322）是一代文宗，据元杨载《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》载，元仁宗不仅视赵孟頫为唐李太白、宋苏子瞻，而且盛称他博学多闻知，操履纯正，文词高古，书画绝伦等等，都为世人所熟知，但其中又称其“旁通佛老之旨，造诣玄微”（《松雪斋集》附录），则不易究明，检之《行状》及同时人撰述，很少有言及赵子昂交通佛道的史实，《松雪斋集》中也没有多少与佛道关涉的文字，较之书画、文词诸项，了不相称。元仁宗此言，是虚称美誉？抑亦纶音如事，世人多未予考究？我既撰《赵孟頫与道教》一文，已考赵氏涉道史实（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1，3）。今特发余墨，一以述前文所未及，再以详明赵氏所撰道书之史实。

一

《玄元十子图》，收录于《正统道藏》洞真部、灵图类“云”字号，又见于清人辑《道藏辑要》“觚”集中，都没有署名作者。明白云霁《道藏目录详注》著录此书为“南谷老师图传”。南谷，宋末名道杜道坚自号。“图传”二字虽非确言杜道坚为《玄元十子图》作者，但似乎此书仅与杜道坚有关。

其实，《玄元十子图》是赵孟頫所撰，今检是书至元二十三年元日赵孟頫后跋，即可明晰。其文称：

南谷先生杜尊师，予自儿时识之，居升元观来十年。升元，盖文子旧隐，其地常有光怪，亦仙灵所栖胜处也。师嘱予作老子及十子像，并采诸家之言为列传十一传见之，所以明老子之道如此，将藏诸名山，以贻后人。予谓兹事不可以辞，乃神交千古，仿佛此卷，用成斯美。师名道坚，南谷其自号云。

跋文既出赵孟頫手，则显明《玄元十子图》为子昂所撰。此跋不见于今本《松雪斋集》。是否出于伪托？这里有加以考明的必要。

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十六载有《赵集贤南谷先生帖》，与上文比勘，文字全同。据卞氏称，《赵集贤南谷先生帖》是从赵氏真迹中录出，则此文确为赵孟頫所撰。那么，赵孟頫曾自言《玄元十子图》为其亲笔，不仅赵子昂自记如此，《道藏》本又载杜道坚跋文，也可为佐证，其中略称：“老子历商周九百余年，当时亲见犹龙如关尹子者，岂特十子而已哉！必有不可知者存。集贤学士赵子昂，本其有书有言者，作玄圣十子像，将使学者瞻其像，诵其言，而求为圣人之徒，是诚在我。”所称“玄圣十子像”实即此书。

赵孟頫既称杜道坚为师，又谓《玄元十子图》乃遵师嘱而撰，是以赵、杜两人关系匪浅。杜道坚，《松雪斋集》中有《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》，即传其事，讳道坚，字处逸，当涂采石人，撰有《道德玄经原旨》、《玄经元旨发挥》、《关尹阐玄》、

《文子缙义》诸书，宋末元初道门高士，为赵子昂师。碑文中赵氏还称：“孟頫粤从髫龄，夙慕高标。先君将漕于金陵，真人假馆于书塾，携持保抱，缘契相投。”考之赵子昂《先侍郎阡表》

（《松雪堂集》卷八），其父赵与峕漕金陵在宋景定元年。时子昂年六岁，即以杜氏为塾师。非仅为“儿时所识”而已，又据任士林《松乡集》卷一《通玄观记》载：“尊师杜道坚，有道之士，蓟丘李衍、吴兴赵孟頫、金华胡长孺与之游，执弟子礼。余最

晚。”周伯琦《鹤林先生记》也说：“南谷尝以道法显于国初，吴兴赵公子昂犹尊事之。”（《续吴郡志》卷上）。据上所考，赵子昂与杜道坚关系非同一般。那么，赵子昂遵嘱而行，亦属可能。白云霁目此书为杜道坚图传，未标明为赵子昂所撰，实属疏阔，或亦未究其实。

《玄元十子图》一书，文图兼具。文字即为传说中的老子十弟子一一设传：关尹子、文子、庚桑楚、南荣趯、尹文、士成绮、崔瞿、柏矩、列子、庄周。传外并有图。夷考其实，似应名其为《玄元十子图传》，舍“传”而称“图”，大概是出自后世道书编辑者的用意。在《道藏》中，常有文图并茂，且以文为主的著作而名为“图”者，如“灵图类”诸书《上清太玄九阳图》、《三才定位图》、《周易图》之类都是其比。则此名非为赵子昂自构也就明白了。

《玄元十子图》虽为赵子昂遵师命而属笔，但是在内容上大有可宝之处。我们知道，老氏之学，向无传人，所传关尹述书，事类怪诞，无从稽考，不象孔门师承不绝。但是道教自创立初始，攀缘老子做祖宗，擅造神话，为老子作传之风，日炽其盛，唐宋两朝佞道顿盛，“神传”尤多。《犹龙传》（宋·贾善翔）、《混元圣纪》、《太上老君年谱要略》（均为宋谢守灏撰）都是这类作品，它们都集中在对老子一人的神化与宣传上。《玄元十子图》则图传了老子及其传承者，开辟了道教宣传的新路，深得当时道教内外人士的称许。黄仲珪序《玄元十子图》中称：

玄元十子犹宣圣十哲也。十哲从祀，今昔所崇。十子于吾门中，则未之或究。盖自修文辅教之科，鲜有习者。故十子之学晦而隐，否而塞。方今真风畅达，玄俗还淳，孔老通家，道德同尚，十子之学，彰彰有光矣。

黄仲珪的推崇，正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此的称道。在历史记载中，老子所传十子，无事可征。赵子昂所制，虽然是“本其有书有言

者”（杜道坚语），但推究赵氏真正的用意，并不是在考明历史真相，更确切的说是借用儒学宣传的套路，使“晦而隐、否而塞”的玄门十子之学显明于当代，为道门日渐手劳心拙的宣传开一条新路。由于赵氏在文坛久负盛名，所以他所为文，尤为道徒所宝，也为习道文人所珍。前所引黄仲珪序已可概见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《玄元十子图》撰成后不久，即元元统三年，著名道士张天雨辑《玄品录》，其《道德品》即全数收录此书十传之文，一字未易，并置《玄品录》之首。其文若是，其图尤为人世所称。赵子昂当年为杜道坚撰文设图后，杜氏得之，视若拱璧。赵氏所交道人，依史所载，多为南方旧道——正一派、茅山宗两系人物，但此《玄元十子图》，最迟在大德七、八年间就为寓居钱塘的全真门人路云溪（明真）集众缘而刻传，从而使“四方学者隐然得之仪象之间”（黄石翁语）。现在的《道藏》本即从路氏所刻得来，虽然或失其真，但仍可得其仿佛，足可称宝。考艺文志及画史者，于此均应留意。

杜道坚对赵子昂此作尤其属意，最先按赵氏所绘影像，在计筹山通玄观筑老子祠，老子塑像就是按赵子昂所绘而制。大德十一年，杜道坚又在杭州仿通玄观再建老子祠，并设十子殿（参任士林《松乡集》卷一《老子祠碑》），所谓十子，即玄门十子，十子殿中人物造型，一依赵子昂所绘。赵氏的作品，从此不仅刊诸竹素，而且更得列于殿堂，供为神品。其所制为世人及道徒所宝，可云重矣。

赵子昂跋文中称“予作老子及十子像，并采诸家之言为列传十一传见之。”验之今本《玄元十子图》，文图都只有十人，独不及老子像传，是流传有失抑或别有它因？今已难考明。但赵氏当年遵嘱而制，本来就不是为了撰成一书，既没有定名，也未置序说。现在流传的实际出自杜道坚、路云溪的热心参与。他们俩人对此或有取舍，也未可知。而且张天雨辑《玄品录》（即《贞

居先生诗集》等所称的《玄史》)中说:“昔《南华》之叙天下道术,尊孔子而不与,今仿其意,于是集(《玄品录》)老子不与,尊之至也。”(《玄品录序》),执此或可称彼。但应明确的是,尊老子而不与者的是杜道坚、路云溪,固非子昂本意。是于《道藏》中得子昂一《玄元十子图》,虽可云宝,亦不无遗憾!

《玄元十子图》之外,赵子昂另撰有一道教专著,虽不见于诸史艺文志,其序则仍存于道教要籍《茅山志》(《道藏》洞真部,记传类“龙”“师”“火”字号)中,文称:

夫高栖林岭,必先抗青云之志;涵濡玄味,必远寻丹水之源。凡学有传,孰大于道。是以古之学道者,以得师为急,为师者以得人为难;而况仙者非有永于人道者。初不假于外准,当爰清爰静,归心归诚,所冀真灵感应耳!信者功德之母,惑者进修之贼,可不慎欤?华阳洞天自汉三茅君飞升于此,魏晋而降,仙者栖武。神君仙人之所主治,云裾霞佩之所游集,盖地上之天宫,人间之仙境。故昔人谓道门华阳,犹儒门洙泗。欲以凡言赞叹,弥觉费辞。上清玉虚真人刘君大彬,命工传写祖师真像,自紫虚元君,都四十五代,俾孟頫又作小传附书其后,藏之山中,以贻来叶。俾知传授之绪,希心存目注,无坠玄风。窃惟兹山之灵异,斯道之显扬,皆自贞白陶君著书立言,网罗搜访,不遗余力。故茅、魏遐躅,尚获仿佛于无言之表,杨、许旧迹,犹可追想于既逸之余。慨然远怀,神情飞越。嗟呼!安得从陶真人于雷平、柳沂之间,执弟子礼以供笔砚之役乎!庶几《考槃》、《硕阿》,鉴性泓潭,草衣木食,以终余年,老愿毕矣!岂敢觊长生不死,神仙轻举耶?延祐七年庚申岁九日,前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序。

此文不见于《松雪斋集》，原题《上清传真图序》（《茅山志》卷三十三）。这篇佚文说明，赵孟頫撰有《上清传真图》一书，时在延祐七年。考赵氏延祐六年告老致仕，三年之后谢世，那么据此序文可知其书撰成于赵子昂晚年。

此书虽然不见任何著录，后来也没有流传，但据我们所考，赵子昂此书曾为元代修纂道教名著《茅山志》所利用，尤为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的完成奠定了基础（参拙作《〈道藏〉本〈茅山志〉研究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2.2）现试证成其说于后。

首先，从《上清传真图序》所反映的情况来看，赵子昂所撰上清诸真小传，上起紫虚元君魏华存，凡四十五代，与今本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所叙上清历代宗师起讫及代数都相同，尤其巧合的是，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所叙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事迹仅至延祐四年，即赵子昂撰成诸真小传之前。考《茅山志》定稿于泰定元年（1324）至天历三年（1330）之间。刘大彬作为修纂《茅山志》一书的主事者，可叙史实应该很多，为何反而付诸阙如？我们的推断是，《上清品》诸传袭用了赵子昂传稿，而于刘大彬一传尤现端倪。不然的话，很难究明《茅山志》独独不详叙刘大彬史实的原因。而且根据我们的考定，刘大彬作为编纂《茅山志》的主事者，曾延请至交张伯雨为捉刀人。张伯雨在当时既富文名，又狷介难俗，所以优游道门，而独与刘大彬称善。^①刘大彬于张伯雨可谓知友，张氏以此知遇之恩，为茅山撰志，难道只去录存文献而不为当代史实具笔？叩其中原因，张伯雨在《上清品》也多为移录或因袭赵氏之作。那么，以张伯雨的文声、道名，为什么这样行事？细究张伯雨、赵子昂关系便知。原来张氏早岁即以赵子昂为师，及长，交情日深，张伯雨居茅山后，尤与赵子昂多唱和往还。^②张伯雨为刘大彬所请入山修志前，由于赵子昂已因图设传，张氏出于对老师的尊重，不再改易。当然，《上清品》为何独略刘大彬史事，也许还有别的原因，因史事阙如，

也不敢妄断。

其次，从刘大彬与赵子昂的关系以及《茅山志》修撰过程来看，也可以了解赵子昂《上清传真图》与《茅山志》中的内容有渊源关系。先看刘、赵两人的交往。刘大彬为道门高士，而茅山向为文士乐游之园。元代道教兴隆，文人学士对道门趋之若鹜，刘大彬一时成了道门大知客，文人学士从其拜师受箓者甚众，赵子昂也居其例。据虞集《跋赵承旨〈高上大洞经〉》载，赵子昂曾亲从刘大彬受诀入道，足征其关系匪浅。赵子昂《上清传真图序》中明称是撰实际乃应刘大彬之请而撰。考诸它文，赵氏为刘大彬撰文之日，正是刘大彬受命于吴全节着手编纂《茅山志》之时。据刘大彬《茅山志叙录》称：“句曲有记，由来尚矣。考古述事，则犹略焉。大彬登坛一纪，始克修证，传宗经箓，又五载而成定书，凡十二篇十五卷，题曰《茅山志》。”考诸《茅山志·上清品·王道猛传》，刘大彬登坛主事在至大辛亥（1311），其间共历十二年，到至治年间（1322）才藏其事。《上清品》即刘大彬所称之《传宗经箓》^③等篇完成更晚，约在元泰定元年后以后，

（其书今存有天历间诏令，那么《茅山志》定本还在天历以后）。刘大彬既然在修志的开始即礼清告归的赵氏为之撰文修书，既可以借重赵氏的文名，为《茅山志》的修撰打开局面，又可以大加袭用。况且《茅山志》设《上清品》为茅山四十五代宗师叙传，赵氏所撰也是上清四十五代人物，所以我们认为赵氏之作为《上清品》的渊源之作，恐非臆测。

其三，明江永年《茅山志识语》曾称：“旧志（指刘大彬本）编自前元宗师刘大彬，传于翰林承旨赵孟頫，赞于大学士虞集，书于华阳外史张雨，世称四绝。（见清笥蟾光《重编茅山志》）江永年“传于翰林承旨赵孟頫”一言，可以作两种解释：一是说《茅山志》的流传是因为得到赵孟頫的推美而流传，一是说《茅山志》中的传记文字为赵孟頫所撰。但是具体按实史

事，江永年所言为后者，即指明赵孟頫撰有《茅山志》传文。现就江氏之说略作考释。

江永年《识语》所言共四事，刘大彬编志之说，已叙于前，无须再及，而考史事，“赞于虞集、书于张雨”二事亦不为虚。虞集撰赞，事见《茅山志》及《道园学古录》。检《茅山志·上清品·嗣上清第一代太师（魏华存）传》后有载：“大元泰定，国子司业虞集撰四十五宗师赞，其赞曰”云云，诸赞语正互见于《道园学古录》卷四十五，题为《三茅山四十五代宗师赞》。至于张雨书《茅山志》一事，则史多明文，尤为艺坛快事。明胡俨《重刻茅山志序》：“按茅山旧有记，而志则始于嗣宗师刘大彬，刻则外史张伯雨所书，甚精洁。”^④又明李日华《六砚斋笔记》卷三、清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卷下、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七都言及此事。张雨所书原版虽早毁于战火，但孙星衍、傅增湘等人都曾见过传本。此外，在元代印刷史上，往往有作者写刻自己作品的风气，如杨桓的《书学正韵》、《六书统》、《书学溯源》、周伯琦《六书正讹》等，都是作者自己写刻的作品，张雨写刻《茅山志》事亦甚确。江永年所叙三事既可确证，则“传于赵孟頫”之说当亦不虚。

那么，是否应该把江氏之说解释为赵孟頫传布《茅山志》？稍做考察，就可究明此说之非。赵孟頫卒于元至治二年（1322），而《茅山志》第一次定稿最早不得居元泰定元年（1324）之前，至如润饰、写定则更在天历三年（1330）左右，赵子昂无缘获见《茅山志》的成书，自然也就无从推美、传布了。所以江永年所称“传于赵孟頫”的意思，如同说“赞于虞集”即“赞为虞集所撰”一样，是指《茅山志》传为赵孟頫所撰。《茅山志》仅《上清品》有传，因此确明《上清品》诸传为赵孟頫所撰。换句话说，赵子昂所撰的《上清传真图》一书，为刘大彬、张雨修纂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所袭用。

不过应该申言的是，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虽沿袭赵氏之作，并且象《刘大彬传》等仍带有明显痕迹，但是难可断言，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中四十五代宗师传文就是赵子昂遗文。赵氏《上清传真图》虽居茅山新志修撰的首功，但因其本为应图而设，即象《玄元十子图》一样，叙事简单，难及其详。张雨后来编此书，一定大有加详，以至于《上清品》一门，又于全稿定型后，又“历五载而成定书”（刘大彬语）。张雨《玄品录》既已辑入《玄元十子图》中的文字，所以于《茅山志》则依其体例，偶加沿用，并且在全书末尾，以《上清传真图序》殿之，或有表遗之意。

上已考明，赵孟頫曾撰有《玄元十子图》及《上清传真图》两部与道教有关的著作，足证他对道教的高度热心与积极参与，那么元仁宗称赞他“旁通佛志之旨，造詣玄微”确非美辞虚誉，而是深得其实。赵子昂除此两著外，于道门撰述尚多，世所尤知者如“张留孙碑”、⑤《轩辕问道图》⑥均为史林、艺坛巨制。世人或以子昂自署“松雪道人”“水晶宫道人”为文人雅谑，⑦恐未得其实，非为知赵子昂者之言。

赵子昂失节事元，为世所讥，历来仅重其艺事。但毕竟他是一代文化宗师，史事关涉甚大，其于佛于道之事，尤应留意，以窥其处世“真情”，所以于考赵氏涉道之余，再发为文，补述赵氏所撰两道书，虽早归亡佚或失题，但于考赵氏史实，或有小补。

注：

①张雨，一名张天雨，字伯雨，其事迹参明刘基《句曲外史张雨墓志铭》，载《珊瑚木难》卷五。

②《贞居先生诗集》（《武林往哲遗书》本）及《茅山志》均录有张雨、赵孟頫《玄洲十咏》唱和之作。

③今《茅山志·上清品》实为《上清经箓圣师七传真系之谱》及《四十五代上清宗师传》两部分组成，所以刘大彬有此言。

④见笄蟾光《重刻茅山志》引，又见明《弘治句容县志》，《天一阁藏明方志选刊》本。

⑤《张留孙碑》，《松雪斋集》失收。参日本吉冈义丰《白云观志》附录及陈垣《道家金石略》（宋元之部·正一派）所收。

⑥参任继愈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所附《年表》

⑦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十“先辈谐谑”条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 中华书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

《辞海》记东汉梁太后生年订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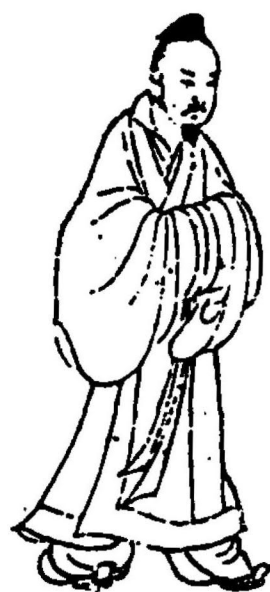
《辞海》记东汉顺帝皇后梁妠生卒年为106—150年（缩印本第1309页，《历史分册·中国古代史》第255页）。

按，《辞海》记梁后卒年不误，而生年误。《辞海》得此结果必据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所载：和平元年（公元150年）春，梁后崩，年四十五岁，即以其卒年和享年上推而知。但据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同卷记载：梁后“永建三年（公元128年），与姑俱选入掖庭，时年十三”，则上推其生年应为公元116年。又按，东汉制度，选人必取“年十三以上，二十已下，姿色端丽，合法相者，载还后宫”。（《后汉书·皇后纪》序）梁后入宫年龄必无差错。故而梁太后生年当以116年为准。再者，梁太后被立为皇后，事在顺帝阳嘉元年（公元132年），时年十六岁，到和平元年（公元150年）死时，《后汉书》又说其“在位十九年”，那么，梁后享年应为“三十五”岁。以此言之，《后汉书》记梁后享年“四十五”本来就有错讹，《辞海》据此推算便也不能不误。

故梁太后生卒年宜改正为116—150年。

· 任士英 ·

南榮子



庚桑子



崔瞿子



士成子

